

# 英語文學對中國女性的描述

陳張美美著 陳愛潔譯



儘管筆者在研究院以喬叟和莎士比亞作為研究對象，但幾乎從擔任大學教職開始，一直對英美文學裡中國女性的描述著迷。筆者覺得自己對於兩方面也略有認識。但是，直至八十年代末期，筆者才開始認真研究中國女性的文學描述整個問題。結果是一九八九年由三聯出版社出版 *Through Western Eyes: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一書。書中記載了幾篇文章，論及有關中國女性在西方文學，主要是英國文學中的描述。它們湊合成一幅圖象，描繪了中國女性形象的演變，直至一九九零年左右。自從那年代起，經歷了許多重要的發展，為中國女性在英語文學中的描述帶來鉅大的影響，而筆者嘗試了解這些發展的最新情況，並在本文中討論。

直至二十世紀初期，只有少數英語文學作者嘗試描繪，甚或概略地敘述中國女性，而看到這些描述時，必然驚訝這些作家對於中國及華人幾乎完全缺乏認識和了解，情況直至近代才稍為好轉。筆者在研究中國女性形象的演變時，為了增加研究的可信性，於是嘗試努力解決描述的「準確性」問題。

不用說，這問題充滿風險和困難。如何有把握地評估文學的角色塑造是否「準確」？當處理昔日中國女性的形象時，歷史文獻和個案研究至少能闡明某時代婦女所面對的一般狀況和困境。例如：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8 一書，是一個罕見的英語個案研究，以十七世紀中國的一名農村婦女為對象，是非常寶貴的作品。把英語文學跟同時代中國文學對女性的描述作比較也是十分有用的。身為中國女性，儘管不免要被局限於某時間和環境中，但筆者偶然也借助於本身的知覺和演譯的能力。

當然，最早出現而又廣為流傳的東方女性描述，可見於《東方見聞錄》（*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正是他讓西方注意到中國女性的美麗。對於未來的西方讀者而言，其中一段可被視為概括一切與中國女性相關的迷人素質，用了僵化的觀點來描繪。馬可波羅形容杭州富商的上流生活：

至於商人，他們人數眾多，又那麼富裕……所以沒有人會注意此事……他們的妻子……都是最細緻和天使般的受造物，身穿綾羅綢緞，而且珠光寶氣，這一身華麗服飾的價值更是無法計算……男人和女人的皮膚白皙，樣子娟好。他們大多數穿著綢緞……

他也詳細描寫忽必烈汗的多妻習俗，而且不經評論便立刻講述他的妻妾成群和奴役女性。我們可看到他詳細描述如何挑選妻妾，這必定滿足大多數西方大男人主義者的幻想。

無論古今，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一直

廣受流傳。例如，企鵝出版社於一九五八年出版首個英譯本，一直以來已重印超過十次。在馬可波羅遊歷中國約五百年以後，對於西方來說，中國和中國女性依然是遙遠的和神秘的，儘管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航海家、旅遊家和傳教士的活動帶動西方與中國接觸。直至十八世紀中葉，耶穌會士一直是東西方之間的重要連繫。十七世紀下半葉，他們更在中國擔任官員。他們也是中國最好的辯護者，並提出有利於中國人的匯報，顯然有別於部份商人的某些不利的報告。

十八至十九世紀期間，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從英國人的眼光看中國和中國女性。一七九一年，馬戛爾尼（MacCartney）的特使團啓程前往中國，其主要目標是為了洽談貿易。這次旅程雖然未能達成具體的商業目的，卻帶來深遠的影響，令許多人對中國感興趣。馬戛爾尼撰寫遊記，其中顯示中華文化的某些方面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八零七年，即他逝世一年後，他的著作面世。至於特使團

的詳細資料，已於一七九五年由馬戛爾尼的近身僕人阿奈亞斯·安德森（Aeneas Anderson）出版。這些報導大受歡迎，使有關這個主題的刊物日增。

人們普遍對於中國持有模糊和浪漫的觀念。

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英語文學中，也經常出現中國和華人的主題。在物質層面上，茶成為一種日漸流行的飲品。東印度公司所載運的大量貨物就是茶葉。森姆·佩皮斯（Samuel Pepys）在他的《日記》（*Diary*）裡，敘述自己在一六六一年九月的某一天，第一次喝茶的經驗（London, 1906, p.101）。隨著茶而來的就是瓷器。但是，這種對於中國和中國事物的著迷流於表面，並沒有令人真正嘗試認識和了解這個國家及其人民。二十世紀前的著作在描寫中國和華人時，相當片面、失實和不準確。尤其令人惱怒的，就是作者顯然過於自滿，拒絕多加發掘。

研究十八至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我們很難發現作者嘗試對中國人作為整體民族的描述，更不

用說描寫個別的中國人。若翰·彌爾頓（John Milton）的地理描述中對「中國人」的概念含糊其詞。（《失樂園》*Paradise Lost*, III, 1.438）在十八世紀，森姆·約翰遜（Samuel Johnson）利用中國來暗喻人類最遙遠的他方……從「中國到秘魯」瞭望人類（*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1.2）。笛福（Daniel Defoe）在《魯賓遜飄流記》（*Robinson Crusoe*, 1719）包括一個「中國的」部份，但他對於中國的認識似乎不過建基於道聽途說和偏見，以及自鳴得意的沙文主義。筆者認為其中一段尤其有趣：它描述中國女性的奴婢地位，以及粗俗的中國男人那種令人討厭的大男人主義。這樣的西方觀點似乎滲透了《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一類的作品。

這位紳士坐在樹下……樹下還擺放了一把大傘子……他懶洋洋地靠在寬敞的扶手椅上。他是一個很重的富翁，兩個奴婢把他吃的肉端來；他還有另外兩個奴婢，我想，

在歐洲只有很少數紳士會接受她們的服侍：一個用調羹餵這位老爺，而另一個奴婢拿著碟子，擦去跌在尊貴的鬍子和馬褂上的碎屑，而另一個……

在《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 1762）一書裡，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嘗試透過一個傀儡中國佬來諷刺歐洲，卻沒有嘗試刻劃這個諷刺工具的性格：書中的信函基本上是諷刺作品，針對人性的缺點。他並不擔心事情的細節是否準確。儘管第十八封信的題目是「一位中國夫人的故事」，但他毫不掩飾地把夫人和她的丈夫介紹為「朝鮮王國最痴情的丈夫……和最使人喜愛的妻子。」在敘述這位中國夫人在第二次結婚時，如何打扮自己。他竟描寫她的「鼻子穿戴了非常珍貴的珠寶」，顯然把印度和中國的習俗混淆。在第九十四封信大大出乎意外的一段裡，哥爾德斯密斯談到當時東方男人實行的一夫多妻制。信中的小情郎歌頌他的妻子，並評論：

妻妾、妻妾……擦掉世界的一切不便。

況且，我得知……亞洲美女是現存最好的情婦，因為她們沒有靈魂；的確，在大自然裡沒有比沒有靈魂的婦女更應令我如此喜歡……

的確，整部著作的許多地方都令女權主義者感到不安，但是，由於文章完全沒有尊重事實，並且以玩樂輕率的態度論述中國女性及中國習俗，因而令中國的女權主義者更感困擾。

大家毫不掩飾地承認對中國及其風俗一無所知。亨特（Leigh Hunt）在一八三三年致 *Tait's Magazine* 的一封書信（收錄於 *The World of Books*）強調這種無知：

先生，對我們來說，中國是一處很陌生的地方……  
但是，他繼續訴說西方人士對中國人公式化的泛論：

但是，誰不熟悉這茶葉之地，以及瓷器、

叩頭和塔，以及橘子、孔子，和圓帽子，以及有別號，細眼、小腳的人，他們坐在小小的樹蔭處，喝一小杯茶，和寫小詩歌？

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

在他的「中國」一文裡，對華人作出既長篇又毫不留情的抨擊——「這是最可憎和最愚蠢的國家」。他的評論針對整個中華民族，正如穆勒（J.S. Mill, 1806-1873）批評中國人遵奉固定的行為準則和習俗，其結果就是完全的停滯不前和缺乏進步。（《論自由》On Liberty）只要中國女性受到關注，我們大多暗示他們容忍成為男人的性對象和娛樂的來源，而不是個體。馬可波羅形容中國女性擁有皙白的皮膚，身穿綾羅綢緞。這時期的西方文學仍堅持中國美女既苗條又充滿異國風情的這舊框框。多個世紀以來，柯爾律治（S.T. Coleridge）在《忽必烈汗》（Kubla Khan）中敘述那神秘女人「為她的情人哭天哭地」的描寫，一直令西方讀者著迷。

在十九世紀，雖然英國與中國的接觸主要涉

及貿易，但也有一些傳教活動。許多學術性的和有用的工作，都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等傳教學者所完成的。他們致力讓歐洲人更容易接觸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化。這是他們致力令中國人皈依的部份工作。馬禮遜認為，學習華語並不足夠，而他的中文字典加插他對中國人的觀點，並介紹中國歷史、地理，以及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面。但是，儘管他和別的傳教士努力，歐洲人甚少願意更深入認識中國語文和文化。一般來說，他們不是從人的觀點來看中國人。

也許，最能向西方演譯中國民族思想的作家，要首推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嘗試讓英語讀者接觸中國經典的豐富遺產。對那些感興趣的人來說，可透過理雅各的《禮記》譯文而能夠了解中國女性在社會缺乏地位的情況：

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牲）

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往毫無地位的中國女性形象闖進了西方人士的意識裡。這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慈禧太后，在國勢日漸衰落的清朝攝政，在一八六一年至九零八年垂簾聽政。一九四二年，莫里斯·科利斯（Maurice Collis）的話劇 *The Motherly and Auspicious* 在倫敦的舞台上演，內容描述慈禧太后的功績。慈禧是吸引人注意的中心，必定對於創造一個個別中國女性的新概念有所貢獻。雖然作者的人物描寫處處見有框架，但與我們在 Hsiung Shi-I 的 *Lady Precious Stream* 中所看到的人物已有很大的分別。該劇雖然由中國學者撰寫，而且在三十年代的英國相當流行，卻不過迎合西方人的期望；他們傾向於認為中國人是奇特而落後的民族，盛行盲婚啞嫁和習用古訓。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出現了一種描寫華人的新文學。當時，大批華人移民到美國，其中主要是勞工，這意味著美國人有機會觀察華人，主要是勞動階層的生活方式；他們在異鄉的

社會地位低微。本地人以懷疑、恐懼和鄙視的態度看待他們。在一個出色的研究報告——*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1958)，依薩克斯 (Harold Issacs) 詳述這些態度。男人寧願獨自前往「金田」，把他們的女眷留在中國。其後，美國拒外法案（1882-1958）亦限制婦女入境。因此，美國人唯一可見的中國婦女，就是那些女招待和聲名狼藉的女人。哈特 (Bret Harte) 與馬克吐溫 (Mark Twain)，以及十九世紀下半葉其他作家的作品，都只是列舉華人的邪惡和荒謬的例子。中國婦女的俗套形象，不外乎是風騷妖艷的。透過薩克斯·羅默 (Sax Rohmer) 這一類書籍，中國「龍夫人」(凶猛的婦人) 在美國文化中逐漸流行起來。該書描寫邪惡的、善於操控他人的傅滿洲 (Fu Man Chu)，和他那個珠光寶氣、悉心打扮、斜眼角的女心腹。

描寫中國民族，特別描寫中國女性的轉捩點，隨著部份西方（大部份為美國人）記者和傳教士在

二十世紀初期抵華而出現。她們以直接觀察中國及其人民，並看見一個正處於風雲變幻的中國，一處因內戰、學生動亂和軍事鎮壓而四分五裂的土地。賽珍珠 (Pearl Buck)、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 與海倫·福斯特 (Helen Foster) 等女作家深刻地意識到中國婦女的境況，如何從她們封建的過去跨越到現在。在一、三十年代，以致四十年代中日戰爭期間，這些作家的作品中對中國女性的描寫，不論是歷史、小說，歷史小說的角色，在西方前受不同程度的歡迎。例如賽珍珠在歐美擁有衆多讀者，她的《大地》一書的全球讀者人數達到一百萬，她更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另一方面，史沫特萊的讀者雖然較少，但也有成就。她的自傳式小說《大地的女儿》，在美國有少量發行，並獲收納入一些婦女研究的課程中。

在二十年代後期，透過韋利 (Arthur Waley)、龐德 (Ezra Pound)、賓納 (Witter Bynner)、洛威爾 (Amy Lowell) 和艾斯庫 (Florence Ayscough)

等譯者的作品，中國詩辭，尤其是唐詩成爲一種時尚。打扮艷麗的美女形象，如白居易詩歌裡的楊貴妃，開始給鑑賞家的小圈子留下印象。漢代的樂府也描寫戀愛中和受壓迫的婦女，女性是審美的對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加入西方盟國陣營，而宋氏姊妹——藹齡、慶齡和美齡，尤其是宋美齡——成爲西方，尤其美國的傳奇。

一九四九年，就是所謂英語「香港文學」的開始，除了少數由英美作家選寫的作品外。其中第一部獲得國際稱譽的「香港」小說，大概就是韓素音的 *A Many-splendoured Thing* (London 1952)，給予西方一個歐亞婦女的審慎描寫。韓素音堅持她的中國意識和態度。自從該書出版後，更多的「香港小說」陸續面世，包括：克拉維爾 (James Clavell) 的 *Taipan* 與 *Noble House*，埃勒根特 (Robert Elegant) 的 *Dynasty*，克里斯托佛紐 (Christopher New) 的 *Shanghai* 和 *Change of Flag*。這些著作有不同程度的優點，還描寫不同階層的中國女性，擴

闊斜眼角的蕩婦形象舊框框。

同時在美國，第二和第三代的美籍華人在短篇故事、小說和劇本等文學著作中越來越強烈地表達自己。她們的著作大多集中於有關疏離與融合的主要題，也集中於她們民族的「根」。一種逐漸獲得認同的獨立文學類型——「美籍華人文學」——的表表者，包括一些擁有許多讀者的作家，如 David Henry Hwang，Maxine Hong Kingston，Amy Tan 和 Gish Jen。這些作家無疑爲創造有血有肉的中國人物作出了更大的努力，但輿論在判斷這些描述是否「公正」和「準確」，則沒有一致的意見。有些評論家，以及許多華人讀者和看過一些改編自這類作品的電影的觀眾，則發現他們利用這些人物，故意強調中國人物性格的「奇特」，製造一些新的模式，例如非常野心勃勃的「中國母親」，她「充滿柔情」說出令人尷尬和捧腹大笑的英語。

另一種描寫中國與華人的體裁已出現。其中不少是自傳式的作品，訴說的中國女性在中國成長

的故事；她們經驗歷史與文化的鉅變，最終在西方定居。我們立刻想起 Nien Cheng 的《上海的生與死》(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 和張戎的《鴻》( *The Wild Swans* ) 等作品。在這類作品中，作者傾向於帶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可怕。她們以緊湊和熱情的筆觸敘述故事，並引起讀者強烈的情緒。這與早期著作裡所遇到中國女性單調描述有天淵之別。

顯然，有一系列的因素一直在發揮作用，為探索英語文學中的中國女性形象的研究帶來更樂觀的前景。首先，時代一般趨向於更加開明、更加自由。其次，世界的確逐漸變成地球村。國際旅遊、有關中國的書本越來越受歡迎，還有傳媒和互聯網的發展，意味著越來越多人接觸描寫中國婦女的實況。我們仍要繼續前進，但當大部份人不再視中國和華人為神秘和不可接觸的時候，那麼，甚至粗製濫造的作家亦將會從多方面描寫，並只因缺乏技巧或知識，而不是因缺乏關懷而未能達到目標。第三

個因素涉及女權運動。女權主義作為一種戰鬥性的運動，可能已難再發揮威力，但一個值得稱讚的副產品，就是它使女性對於文學、寫作和文學創作產生興趣。由於希望了解並以同情的態度聆聽不同民族、國籍和信念的女性，華籍女作家的作品越來越易於翻譯，而更多中國女性只要透過她們的譯者，便有機會對西方讀者「講話」。至於第四個因素，筆者經已提及。越來越多的作家——如張戎和 Yen Mah (《落葉》 *Falling Leaves*, 1997) ——成功以英語寫作，有助於釐清西方人士對於中國女性的幻想。

筆者花了超過二十年的時間分析和評論中國女性在文學中的描寫，決定現在應親手嘗試文學創作的過程而不是文學批評。筆者的第一部歷史小說 *All the King's Women* 已於二零零零年五月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從圈內人的角度描寫二十世紀初期一個富甲一方的男人的家庭生活。Lee Pak Hung 財雄勢大，別號「King」，在一九一四年廣州

「商人公司」崩潰後逃往香港，並在當時屬華人禁

地的山頂居住。皇帝住在大宅裡，妻妾成群、三位姊妹和四十八個僕人（還未包括妹仔）、無數窮親戚和食客，以及一些小孩子。筆者嫁入了一個差不多同樣複雜的家庭，並從現實生活的人物和境況汲取靈感。雖然該書集中於皇帝一生中的八個女人，卻對於中國女性的一般生活給予歷史的觀點。八個女人的故事由皇帝及其祖先的故事連繫，但每個故事亦可單獨閱讀。

筆者以兩個特殊目標作出發，希望盡力把女人描寫為人，而不是漫畫，並在寫作期間依從某些在寫作文學批評時所採用的準則。一般來說，這些原則是：（1）人物的情緒和動機必須具有正常的變化，因為情緒和動機事實上由他或她身處的環境所塑造；（2）人物顯然是個體，從故事的背景來看，個人所關注的問題既真實又令人信服的；（3）所有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描寫和價值觀都是準確的，並且適用於人物身上。（參考 William F. Wu, *The Yellow*

Peril, Archon, Hamden, Conn. 1982）

除了盡力公正地描寫女性人物和她們所居住的環境外，筆者還切意製造一種氣氛，是不常見於有關中國封建歷史的小說的。在這一類小說中，氣氛一般是陰沉的，妻妾之間勾心鬥角，還有痛苦和沮喪的氣氛，都是司空見慣的。儘管完全意識到在那些日子裡，大多數女性的生活可不是開玩笑的，但筆者嘗試以幽默和輕鬆的手法來舒緩這種氣氛。大多數女性都是勇敢的和圓滑世故的，而且身處當時的社會和文化習俗裡，她們能夠照料自己。在寫作這部小說時，筆者急切堅持上述的第三個準則，即忠於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價值觀。正如優秀的學者所應做的，筆者曾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故事涉及一些歷史和社會利益的主題，例如長子嫡孫的重要性、纏足的意義、立妾的制度、妹仔、華南地區的各種婚姻模式，例如遲婚、代新娘、自梳女等。筆者嘗試以人性、嶄新和清新的方法（正如任何好作家所應該的）帶出這些主題。

□ 作好家